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二十世纪台湾佛教文化史研究

江灿腾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二十世纪台湾佛教 文化史研究

江灿腾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台湾佛教文化史研究/江灿腾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254-272-3

I. ①二… II. ①江…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文化史-台湾省-20世纪-文集 IV. ①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088844号

二十世纪台湾佛教文化史研究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清修法师主编)

江灿腾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张伟达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450千字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272-3

定 价: 45.00元

作者简介

江灿腾,男,1946年11月3日生,台湾桃园大溪人,汉族。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文学博士。现任北台湾科技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台湾佛教文化史、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东亚近代佛教史等。

著作已有十多本,而其中64万字的《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一书(台北:南天书局,2001),是研究台湾佛教近代文化史的代表著作。近作《台湾佛教史》一书(台北:五南书局,2009),则是第一本书写台湾佛教三百年通史的专著。

学术荣誉:(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纪念奖学金八次得主。(2)第一届宗教学术金典奖得主。(3)第二届台湾文献杰出工作奖的得主。(4)获选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5)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校友会论文奖得主。(6)林本源文教基金会年度最佳论文奖得主。

电子邮件地址:chiang1946@gmail.com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



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

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辨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教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 would 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



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目 录

总 序	朗 宇(1)
序 一	张新鹰(1)
序 二	何建明(7)
自 序	
——我如何开展近代台湾汉传新佛教文化史	
的研究	(14)
导 论	(34)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宗教行政法的建构历程	
.....	(42)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新佛教运动与儒释冲突

..... (74)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本土新佛教雕像的创作

——黄土水与龙山寺的“释迦出山像” (138)

二十世纪台湾现代尼众教育的发展与两性平权

意识觉醒的历史观察

——从传统斋姑到现代比丘尼的转型与开展

..... (159)

胡适来台前新禅学研究的肇始及其发展和争辩

..... (211)

战后迄今台湾现代佛教的发展概况(1945-2009)

..... (261)

印顺导师与当代台湾人间净土思想的大争辩及

其新开展 (297)

关于台湾近现代佛教的研究经验与批判意识

答客问 (322)

现代台湾佛教比丘尼的出家经验与社会关怀

研讨会记录 (337)

海峡两岸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百年回顾

..... (435)

二十世纪第一本新女性主义的现代台湾佛教小说	
——陈若曦的《慧心莲》导读	(445)

附 录

“社会禅”的两个新典范

——关于荒木氏《忧国烈火禅》与江氏《曹溪之愿》两书之比较	张昆将(454)
------------------------------------	----------

参考书目	(480)
------------	-------

后 记	(502)
-----------	-------

《宝庆讲寺丛书》已出书目	(505)
--------------------	-------

序 一

《二十世纪台湾佛教文化史研究》应该是江灿腾教授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五本书,他执意要我写一篇序,我无法推辞,却迟迟未能动笔,原因是想说的话很多,不知从何说起。

我与灿腾教授交往将近 20 年了,但 1995 年以前不曾谋面。我是从他有关晚明佛教史和近现代佛教思想研究的著作中先认识他的。当时他是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在台湾学术界还不能说声名显赫,我也不知道傅伟勋教授已对他做出了“将是第一流的佛教研究史家”的预言,但他以只有小学毕业的在职工人身份坚持业余苦学、取得大学学历和硕士文凭、又接着攻读博士学位的非凡求学经历,特别是反映在他著作中的那样一股笃实的学风和蓬勃的锐气,使得一直在追踪台湾宗教学术界成果和动态的我,不能不对他投去一束关注的目光。

一年多的书信往来之后,1995 年,在我力荐之

下,世界宗教研究所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办同意邀请灿腾教授作为访问学者来北京一周,并享受对台学术交流专款补贴。把这样的待遇给予一位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兼职讲师,可以说是“破天荒”的。8月20日,灿腾教授第一次来到北京,我在首都机场第一次和他握手。在通往城里的路上,我告诉他,接他的汽车是所里新买的,他恰好是第一位乘坐这辆车的台湾客人。没想到,灿腾教授随后居然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文章。他视此次邀访为平生殊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在接下来几天与大陆同行的交流中,灿腾教授却让我近距离领教了他的“锋芒毕露”和“不通人情”。8月25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他甚至和黄夏年先生当面发生了龃龉,弄得举座皆有些尴尬。在场的王雷泉教授直呼他为“文坛杀手”、“学界狂人”,大家颌首一笑,心里则委实不大“适应”。他回到台湾,我写去一信,对他在北京的某些态度表示不以为然,他回信竟说要与我“绝交”;然而,他很快就理解了我的一片好心,又来信诚恳地道歉、致谢,从此我们再不曾有过误会。而且,随着和灿腾教授越来越熟悉,我越来越喜欢他的狷介和率真,不少当初“不适应”他那脾气劲头的大陆学者也都和他成了朋友。例如本书就是夏年先生主动邀约灿腾教授自行编选、收入他从朗宇法师获得赞助的“宝庆

讲寺丛书”之列出版的，此举无论于两岸文化交流，或于学者间之私谊，均不失为佳话一段。

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灿腾教授被发现右腿罹患多发性骨髓癌，此后三年，历经手术切骨、化疗、放疗、自体骨髓移植，受罪无数，几度濒危，他始终保持着高度乐观、豁达的心态，笑到了最后，成为这种癌症百分之五的生还者之一。虽然从此只能依靠双拐和轮椅行动，但是，他胜利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竟然在暂停用药以恢复白血球数量的短短三个多月间隙里，夜以继日地完成了6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这是一场被他视为“生命赌注”的拼搏。开始前他曾想：就是生命因此结束，也要结束得非常壮烈。结果，这一次他又胜利了。他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严格的答辩，取得了台湾大学博士学位。灿腾教授不愧是一位创造传奇的人物。他创造了生命史上的传奇，也创造了学术史上的传奇。

灿腾教授的佛教史研究，以晚明中国大陆为始，落脚于近现代台湾。现在，他是作为台湾佛教史专家享誉学林的。近20年来，台湾政治态势和思想格局的变化，造成岛内“台湾意识”不断上升，台湾史学界的研究方向有很大调整。灿腾教授的台湾佛教史研究，不能不说是这种所谓“本土思潮”的一个反映。不过，他的学术视野并未把台湾佛教研究变成一块自

◎ 序 一



我设限的狭窄领域。他利用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变动的时机,与另外几位台湾学者各自为战,相互配合,将原本基础薄弱的台湾近现代佛教史研究发展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生长点。同一段时间里,对中国不同区域的佛教史的研究在大陆亦呈方兴未艾之势,灿腾教授的研究正与此遥相呼应,汇聚成当今海峡两岸学术界推动中国佛教史研究向地域性、专题性、交叉性深入开展的共同力量。大陆出版的他的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多以台湾佛教史为主题,清晰地体现出大陆学术界对他的成果之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价值认定,也由此赋予了这些著作在推动两岸宗教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现实意义。

翻阅灿腾教授的一系列著作,我的感觉经常逸出他所论述的内容之外。他对文献资料的掌握无疑是极为丰富和扎实的,尤其是挖掘爬梳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史料的功夫,他做得非常足、非常深。运用这些文献资料,他勾勒出了台湾佛教特殊的历史文化面貌。从中我看到的,不只是“四大法脉”与祖国大陆佛教法系的血缘传承关系,也有台湾本省籍僧团代表人物身上日本佛教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叠影;不只是光复直至1949年后台湾确立中国佛教“正统”的过程中,各种势力在特定政治条件下的思想行为轨迹,也有对非一元化历史背景下的台湾佛教适应现代社